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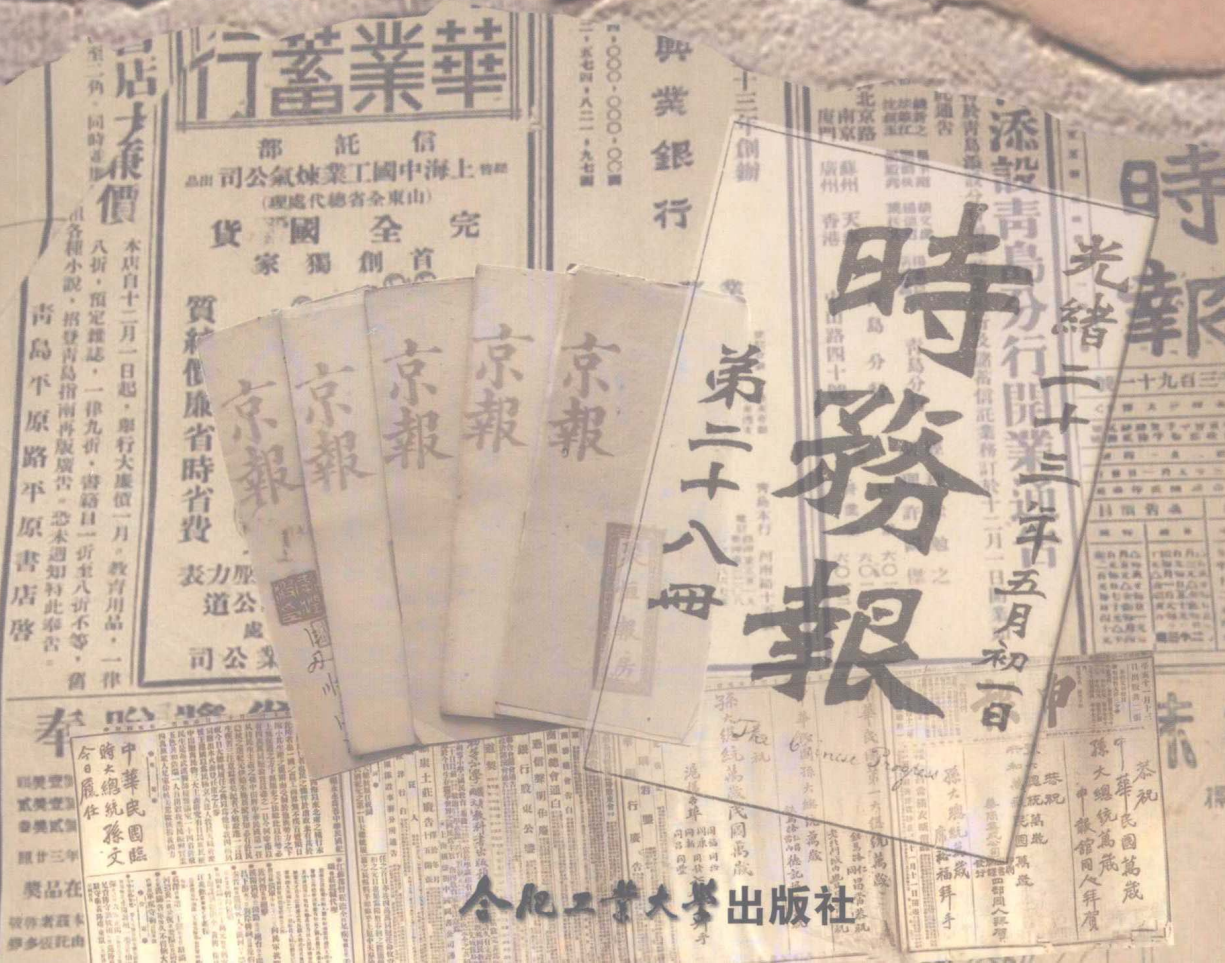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 (第一卷)

王天根
◎
著

晚清报刊

与维新舆论建构

WANQING BAOKAN
YU WEIXIN YULUN JIANGOU



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一卷)

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

王天根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12

(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1)

ISBN 978-7-81093-880-8

I. 晚… II. 王… III. 报刊—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G21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1758号

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

王天根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16.75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281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880-8

定价:2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媒介史是媒介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探究传媒事业发展、衍变的历史轨迹及其呈现出来的客观规律。媒介史应探索传媒行业兴亡盛衰的规律，而不仅仅拘泥于揭示报刊办刊时间、地点、人物等，将活生生的媒介史写成新闻业大事年表。中国报刊通史及媒介通史理应有不同的写法。天根自2003至2008年在安徽大学任教及复旦大学作博士后期间，着手新闻史、媒介史的研究，发表了相关文章，有了些探索，本书便是他在媒介政治功能方面进行学术探索的一部分，即他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第一卷。

媒介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媒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就政治功能而言，媒介既是社会舆论的平台，又往往作为政治资本变成政党牟利的工具。由此而言，媒介史研究涉及媒介与政治压力间的关系。救亡图存条件下媒介史探索，尤要关注党派意识如何作用政党报刊的研究。检视晚清媒介对政治舆论环境的建构及在救亡图存历史条件下媒介与近代的社会动员、反动员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媒介对政治解构或建构的反差，在媒介史、政治史研究上特别有魅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中，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开掘与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纠缠在一起。鉴于此，研究媒介的政治功能一直是晚清政治史、媒介史的难点、重点。对媒介与政治关系的探讨，政治学界偏向政治传播，传播学界侧重媒介扮演的政治角色。天根同志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探索，而这在研究的范式上也对我们有所启迪。

对于媒介史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视角，可从政治也可从文化的层面来探讨。从文化层面看民主、科学等同仁办报思想与从政治层面看政党办报思想，就很不一样。新闻现象呈现的状态虽然不同，但其探究的规律则基本上一致。由此可见，坚持新闻史研究中本体论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新闻学研究中专业精神及学科意识的体现。天根采用媒介与政治建构的分析框架解析晚清媒介政治功能的嬗变，既从外缘的角度检视西方侵略与近代传媒空间上的位移关系，也从内缘的角度分析传媒的党性与晚清的政治变革关系，颇有新意。

天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珍稀资料室及上海图书馆、徐家汇外文藏书楼费时两年，通过对珍稀报刊广泛搜集与阅读，获取了第一手材料，这为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天根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一卷即将出版，撰此以为序。

龚书铎
2008年中秋

内容摘要

解读媒介与政治舆论的关系，须关注媒介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作用。前者侧重媒介研究的内在脉络，后者在媒介与政治建构或解构框架内探究媒介传播的政治效果。晚清媒介为学人瞩目主要是后者。大体而言，中国近代传媒业以政党报刊为主，既与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也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路径。本书前言主要从宏观上论述晚清媒介“通中外”与政治建构或解构的关系。第一、二、三编从历史时段上论述清代中央集权与官方舆论控制功能的关系；列强侵略加深与西方在华媒介殖民功能关系；晚清政治与媒介对维新的舆论建构。就研究思路而言，笔者就媒介与晚清政治转型关系展开论述，以揭示媒介功能在政党利益纷争中嬗变历程及由此呈现的规律性。探究晚清媒介功能既要关注中国媒体自身运动的历史轨迹，又要观察外报刊对中国所起的样板作用及其对维新舆论的影响。研究报刊对近代中国政治舆论建构或解构，尤其要关注社会转型中报人、报业与政治变革的关系。晚清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运用各自媒介为自己牟利，传媒的党性、派性特别强。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下揭示媒介功能的拓展与政治舆论转向的关系，是本书探索的重点难点。

前言

对清末报刊政治功能这一课题的探索，首先要进行概念界定。媒介政治功能的界定，涉及媒介系统的内在属性及社会作用。就清末信息传播而言，媒介话语中“通中外、达新知”主要指报纸为核心的媒介固有的功能与社会作用。本课题中“通中外”指报纸的功能，而“达新知”指报纸的社会作用。从媒介政治功能发掘的角度，检视“通中外、达新知”可见报刊在近代中西政治舆论交流与碰撞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话语表述的基本特征，也为考量晚清媒介政治功能的特质及媒介的政治传播效果提供独特的视角。

一、媒介政治功能辨正及其分析框架

媒介既是折射社会千姿百态的一面镜子，也是政治利益集团的舆论平台与政治资本。媒介与政治的关系涉及媒介政治功能的探讨。

（一）媒介政治功能辨正

就语义辨析而言，媒介功能、媒介作用既有关联，也有差异。有论者认为，媒介功能就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和效果，它指向新闻传播活动与外部世界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价值判断的主体或参照系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内容也就不同，新闻传播活动可以用来维护政权、进行革命活动、满足大众信息消费需要、促进经济发展、传承文化、监督社会运行、获取商业利润等等。^① 媒介的功能指媒介自身固有的属性，一般不会改变。关于传媒的作用，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论述，西方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认为媒介传播有三大作用：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关系；传递社会文化遗产。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传播还有提供娱乐的功能。有学者从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功能层面去

^① 陈作平：《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关系辨析》，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编：《新闻传播学前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06页。

界定媒介功能，称：“新闻媒体参与社会现实程度最深入、最激烈的方式应该数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是社会不同集团利益最集中的体现。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新闻媒体异常活跃，其政治功能就会得以充分彰显。”^① 有论者以报纸为案例对此论述，认为“报纸的职能和报纸作用并立”，报纸的职能是指报纸这种印刷物所具有功能、能力^②。而报纸的作用，是指人们使报纸凭借自身的种种职能所发挥的社会舆论影响^③。大多数学人使用传媒的职能与传媒的作用这两个概念，区分并没有那么严格，往往互用。

报纸作为新闻纸主要传播信息（特别是新闻报道），这是沟通的功能。报纸还发表政治言论，有些与政治密切相关，这是报纸作为媒介的政治功能，发生影响，则是政治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认为报纸使命除了一般人所认为的“传达正确消息”、“建立公共舆论”外，尚有若干潜在之元素：报纸之大众化，报纸之教育化，报纸之时代化，报纸之民族化。该学者认为：“报纸为时代之读物，自应随时代以进展，尤应领导大众以谋适应时代。吾人所谓适应时代者，非盲从一种新的学说或倡导新的主义也，吾人之标准，自以国家之立场，大众之利害，而谋适应时代之方案，譬之国家入于危难之境也，报纸之民族化。”^④ 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更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徐宝璜在《新闻学概论》中称新闻纸重要之职务，表现为：（一）供给新闻，（二）评论时事，（三）补助商业，（四）补助教育。^⑤ 近代中国报刊政治方面时评尤为重要。鲍振青在《余之中国新闻事业观》中称：“夫新闻纸之使命，非仅代人耳目，作政客之传单，实有指导改造之社会之责任。此外发展文化，援助外交，监督政府等均新闻纸重要之使命也。”^⑥ 政客的传单及监督政府皆涉及报刊的政治功能及作用。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中第三章“政治与报纸”。分为三部分论述：“一、坏的报纸和好的报纸”，“二、公众是报纸永久的主人”，“三、‘民治国’的报纸及其他。”这里强调报刊承担的社会责任。以西方为参照系，徐培汀在《休曼与〈实用新闻

① 陈作平：《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关系辨析》，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编：《新闻传播学前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09页。

② 张雅宾：《报纸的职能和报纸作用并立说》，《新闻学论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7页。

③ 张雅宾：《报纸的职能和报纸作用并立说》，《新闻学论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88页。

④ 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民国丛书·第二编49》，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影印，第2-4页。

⑤ 徐宝璜署有“1927年1月梦记”。《新闻学刊全集》（其中有黄天鹏：《新闻学刊·序》），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48），第3页。

⑥ 《新闻学刊全集》，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48），第59-61页。

学》》中称：“自1690年美国创办第一张报纸以来，美国报业经历政论报纸（独立前），政党报纸（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和大众化、商业报纸三个阶段。”^①所谓政论报纸、政党报纸，当然是从政治属性而言的，他认为“现代报纸两大基本功能，一为反映，二为评介”^②。报纸反映多被解读为新闻报道，而报纸评介在近代尤侧重时政评论。因近代救亡图存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及重任，其时报刊等新闻纸承当了言论报国这一历史职责。

大体而言，媒介政治功能是相对于媒介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而言的。就近代中国来看，媒介思想观念上批判民族的劣根性，充当国民性的改造工具，这种教化的功能也可视作媒介的文化功能，但更多的是媒介政治批判属性的现实呈献。媒介刊载广告等对经济发生影响，同时自身从中牟利，这是媒介的经济功能。媒介被政治人物作为手段从事政治权力斗争，或从事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建构，或为政治家乃至政治利益集团牟利及攫取政治资本而发挥的职能，我们称之为媒介的政治功能。因为社会形态差异，媒介政治功能也大不相同。解析媒介政治功能不能离开具体的媒介系统及拟态环境。

（二）媒介与政治建构或解构

研究媒介就是探索信息传播的工具或载体。若把传播信息比作河流，那么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无疑就是河床，信息就是河水。信息与载体的关系就如河水与河床的关系。信息是大千世界变迁的表征，其本身亦处在新陈代谢之中，新的信息内容就要有相应的载体及传播形式。从这一层面而言，信息对传播工具或信息载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满足信息多元传播的需要，犹如河床是河水的载体和容器。同时，奔腾不息的河水也在冲刷河床，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河床的深浅，甚至改变着河道的走向。相比较而言，媒介政治功能并非与生俱来的，也是社会政治变革不断塑造的结果。媒介政治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媒介系统。

媒介系统主要由传媒、传媒行业组织以及传媒规范等基本因素，按照一定的运行规则组成。基本因素还可以细分，如传媒包括报纸、电报等。近代中国媒介系统中媒介包括报刊、杂志等平面视角媒介，也有留声机等声觉媒介。清末媒介系统以报纸为核心。就媒介与政治宣传的关系而言，媒介建构了拟态环境。救亡图存压力下清末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蕴含了浓厚的政治氛围。这种政治氛围就是清末政治上的维新舆论，而媒介有“通中外、通上下”的作用，将西方的政治

① 《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② 《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维新范式这一“新知”从地理空间上横向地向中国传播，同时又在中国社会内部经由意见领袖向社会基层进行纵向传播。媒介功能中“通中外”、“通上下”为“达新知”的基本前提，这就是晚清报刊在维新舆论建构中扮演的角色。

在外在力量的冲击下，媒介系统中某个层面或某部分的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会牵连其他构成因素，甚至导致整个系统由相对的平衡走向振荡，其运行规则由于振荡而调整，最终可能会使得系统的性质发生改变。这一点在清末媒介系统中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列强进逼，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赋予清末媒介系统进行民族救亡的政治宣传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报刊构建舆论，从而为改良或革命等提供可能性、合法性，如维新变法时期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其报刊政治功能大体如此。

关于媒介与政治建构或解构的关系，欧美报刊变迁轨迹展示了这一点。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政党时代。与政党政治同行的是党报兴起。自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大众传媒起步，廉价报纸出现标志着报纸的普及。大众报刊为言论自由提供了舆论平台，而言论自由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一句话，媒介政治功能发挥与拓展，是通过动员社会舆论力量并对政治生活进行监控实现的。

西方报刊发展的路径与晚清中国明显有异，西方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300年间的近代报业发展历程在中国被压缩在80年的有限时空中完成。中国现代意义的报刊并非古代报刊的近代转换，正如有论著称“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①。由于科举制度倾向将文化精英纳入官僚系统，读书致仕，中国的中古社会没有西方职业化的报人。外报在政治、教育、科学、外交、商业、宗教等方面，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报业既继承了西方报业的长处，兼有《京报》的胎记。

就中国报业史而言，中国传统的报业基本上是官报独占时期^②，中国近代意义上官报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其重要目的是在改良与革命舆论交锋中充当官方舆论一律的喉舌。清末民营媒介在新政的政治变革思维中营造改良氛围的拟态环境。而革命则意味着革命者用军队与舆论对清王朝政统的合法性进行权力批判及话语解构。而晚清舆论动员往往通过大众化政治运动与意见领袖的人际脉络等社会资本运作来实现的。晚清的政治变革既有内在的理路，也有外在的因素。在西方暴力的冲击下，清末社会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处失范状态，不同媒介塑造不同的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② 宋代虽有民间小报的存在，却受到官方多方的打击与遏制。

政治权威、灌输不同的政治建构理念。本书第一卷侧重探讨救亡图存压力下报刊媒介与政治利益集团关系如何，清末报刊如何在中西舆论交流的语境中建构政治维新理念，等等。

（三）在大众传播与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中把握清末报刊的政治功能

探讨清末报刊政治动员，涉及对社会通讯网络的分析。中国近代社会通讯网络包含媒介传播网络与人际传播网络。单从传播阶梯来看，媒介传播比人际传播级别高。但在近代政治思潮建构或解构的历史变迁中，两者并非单向度非此即彼的关系。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人开始职业化的进程。众多职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办报、采访。随着新闻业的发展，职业化报人、访员出现。事物变迁往往并非一蹴而就，传统与现代并存多在历史的交织中得以呈现。就传播事业而言。媒介网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立即取代传统的人际传播网络。相反，报刊等媒介网络背后有着军政利益集团为本位的人际传播网络存在。人际传播往往为媒介网络提供地缘、利缘、血缘等纵横交错的信息沟通。而救亡图存条件下的人际沟通多有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媒介网络在学术与政治对峙、交流的状态中有形或无形的存在着，在学统与治统中抉择两难，这就是近代中国媒介系统的状况。媒介网络与人际传播网络的重叠与错位，是近代中国报刊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历史现象。

从意见领袖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看，清末媒介功能的发掘与政治家或政客、政党对舆论环境的建构有内在的一致性。维新派、革命派在政治利益上的共谋、冲突，是媒介政治功能发掘的动力机制。在斗争中善于利用媒介网络进行舆论动员的政党或军政利益集团，往往在更大程度上牟取政治功利。媒介所以在政治生活中有呼风唤雨的作用，与政治家、政党对其掌握与控制，以及对媒介政治功能发掘密切相关。无论是革命派代表孙中山、胡汉民，还是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他们论说的价值取向，皆体现对政治性报刊的办报风格塑造。这些意见领袖如何利用报刊“通中外”、“通上下”的功能，做到“达新知”，即维新理念在思想上启蒙？这是本课题的重心所在。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写作思路

任何学术成果的取得，皆参照以往研究经验及心得。清末报刊与维新舆论的建构关系，史学界、新闻学界亦有成果涉及，下文对此作一综述，并结合研究薄弱环节，提出探索的路径及方法。

（一）本课题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大体而言，晚清传媒事业以政治性报刊为主，既与军政利益集团或政党政治密不可分，同是也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路径。学界作了一些研究，代表性意见如下：其一，救亡图存的政治压力与政论报的关系。（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认为，战争激起了传播转变。经甲午国耻的打击，报纸激荡成重要的传播媒介。办报的重心放在配合政治的运用上，文人报纸打成一体。^①他还认为政治势力一抬头，企业性报纸就会受压制。^②曾书有政治倾向，这些论述值得推敲。由于海峡两岸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他带有政治偏见，以他眼中所谓国民党上重大政治性的历史事件作为新闻史分期标准。同时，第一手报刊资料有待补充，部分近现代文献类史料存在误读；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及媒介功能变迁等论述有待展开。其二，报刊与政党关系也是研究的焦点。宁树藩认为“新闻史可以从政党报刊角度切入来研究近代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他认为中国政党报刊还可和西方传媒比较。宁氏的思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目前这方面有功力的学术成果鲜见。其三，媒介政治功能发掘与传播思想对媒介功能的认知这两者关系。方汉奇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中称：“政治是制约传播思想发展的一个因素。”^③他认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从外部、内部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得形势向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向转化。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从开风气、开民智、开言路、通情况、助变法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办报的目的和办报的必要性。从“喉舌，国口，民史”、“利器”、“党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方面论述报纸的性质和作用，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论述了其办报为革命服务的政治目的。他们还从“报纸是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报纸具有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的作用；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国民文化科学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④这是意见领袖们传播思想探索开拓性论述。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认为近代传播思想是在西方文明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在“西学”启蒙下进步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的政治生态环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9版，第10页。

②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9版，第4页。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77页。

④ 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62-178页。

境的“群像”，是遭受列强侵略从失败悲剧中逐渐觉醒而寻求拯救中国的理论探索^①。该书探索了救亡图存条件下传播思想嬗变历程。

综上所述，晚清报刊政治功能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过去中国传媒史探索过分强调媒介的阶级性、党性及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失之片面是显然的。20世纪90年代初，评价的尺度发生了变化，有些学术论文以当代和平建设时期的传媒理论评判中国近代传媒史成败得失，看不到它与救亡图存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交织的社会网络的关系，鲜有考察中国近代媒体政治功能开掘与社会网络制约这一历史现象及其呈献的规律。已有成果多注意传媒事业发展，而少分析报业等维持旧价值系统的历史惰性。这些研究价值取向阻碍传媒史研究。虽有些新闻史论著或从媒介史角度或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媒介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索，但将救亡图存压力下媒介政治功能的发掘，与维新舆论结合起来交叉研究鲜见。

（二）本书主要内容及研究重、难点

1.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二、三篇从历史时段上结合专题研究，论述清代中央集权与官方的舆论控制；列强侵略加深与西方对华报刊舆论评判；清末政治维新与媒介政治建构等方面关系。从专题层面探析晚清政治转型与传播思想的嬗变；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晚清媒介表述的政治等论题，重点分析“清末媒介建构中政治舆论环境与政治建构中的媒介资本”，就媒介与清末的政治转型互动关系展开探索，以揭示媒介功能在政党利益纷争中嬗变历程及由此呈现的规律性。

2. 重点难点。探究清末媒介功能要关注媒体本身，研究媒介系统的基本社会语境。在近代中国尤其要关注社会转型中报人、报业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大体而言，清末思想启蒙不够深入，政治家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思潮之间有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的拉近只能通过“开民智”，养成民众在政治道路抉择及判断上的价值理性。这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因此，近代传媒功能常表现为以思想灌输为主的政治宣传，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宣称媒介扮演的“耳目喉舌论”，侧重的“喉舌”；孙中山鼓吹“舆论是革命之母”，侧重的是媒介制造舆论。就是例证。与此同时，清末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也运用媒介为本集团牟利，传媒的党性、派性特别强。如何广泛而深入地揭示媒介功能的发掘与政治转型中舆论动员的关系，是本书探索的重点。

就政治动员而言，晚清政党报刊有两方面作用：有垂直动员，主要表现在引导民众与帝制妥协到决裂的过程；有横向上的政治动员，思想启蒙引起资产阶级

^① 《主编絮语》，金冠军、戴元光：《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6页。

内部势力的分野，其中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性报刊转向革命宣传。笔者从这个角度切入课题并作解读。

（三）思路和方法

本书采用媒介与舆论建构的分析框架，解析清末报刊政治功能的嬗变。在研究思路，既从外缘的角度检视西方侵略与近代传媒在空间上的位移关系，也从内缘的层面分析传媒的党性与清末的政治变革关系。本书采用总论、分论的结构方式。采取历史纵向剖析的方法，同时注意横向比较。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及政治制度在西方舆论评判过程中发生了现代性的断裂。时过境迁，中国终就走出被殖民的历史困境。反省近代中国政治规训及历史传统付出的代价，是否应以近似考证的态度对待站在西方舆论场景中的对华传媒？西方对华传媒如何充当剪刀这一工具，裁剪中国既有政治制度及思想理念？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绝非仅仅看些报刊史料的发展刊词就能判断清楚的。在研究中须关注报刊内容及其编排形式体现的报刊风格，报刊风格与时评把关人的关系等，这涉及媒介史研究的路径。缘是，近代报刊的解读准确与否，与研究视角密不可分。将近代报刊作为新闻史料来审视，从报刊中摘章寻句，经过作者的内在逻辑或材料呈现的逻辑，重构事实真相或复原历史，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正如新闻报道，有人光凭报道本身来恢复对往事或某种场景的记忆，报纸上的新闻只是印刷机器记录的结果而记者为何此处一笔带过，而彼处浓墨重彩？报纸新闻或时评能否把握事情真相，往往与记者或评论者大脑不断地思考及考察问题的立足点不停地变动，密切相关。记者或评论员把握事态虽有角度的不同，但稿件还要经过“把关人”再次审查。除关注报刊本身的内容外，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要探讨报刊“把关人”思考的行径及把关的标准。本书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本书侧重从晚清的历史时空出发，动态地考察媒介政治功能开掘与舆论动员及反动员的关系；从政治话语建构，看清末办报高潮与媒介政治功能拓展的关系。将报刊政治动员与维新舆论建构结合起来，对推进报刊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亦有所助益。这在学术研究范式上也是有益的探索。本书尤注重报刊资料的发掘。诸如书中涉及《行在钞报》及部分京报，多属珍稀史料，可能系首次刊布。笔者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对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外文资料多有网罗，两年不辍，目力及财力所耗甚巨，但获益亦丰。部分英文报刊内容亦系首发。史料的扩充也有利于其他学术研究的拓展。本书对清末社会通讯史和政治观念变革的研究，有利于把握清末知识分子身份的边缘化状况与职业报人群体形成的关系，这对加强国情的认识，也有积极意义。

目 录

序	龚书铎 (1)
前 言	(1)

第一编 清政府与舆论控制

第一章 晚清中央集权下媒介政治控制	(1)
第一节 上谕汇编及《行在钞报》刊行与专制者话语表述	(1)
第二节 《京报》与传媒合法的民间身份	(6)
第三节 南北小报对政治消解与民间舆论娱乐化	(12)
第二章 清末新政与官方舆论控制	(22)
第一节 南北洋官报样板示范与行省官报推行	(23)
第二节 清末政治舆论失范与媒介控制	(45)

第二编 外报刊与晚清舆论

第三章 对华早期中文报刊与列强利益表述	(53)
第一节 对华传教士空间上迂回宣传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	(54)
第二节 殖民地化香港与《遐迩贯珍》、《香港船头货价纸》营业	(75)
第三节 租界化都市上海与《六合丛谈》、《汇报》、《万国公报》 对华新策	(89)
第四节 对华中文报刊与宗教性传播组织	(114)

第四章 对华外文报刊大本营上海与列强政治舆论表达…………… (125)

第一节 清末上海的外报刊兴盛…………… (125)

第二节 外文报刊与列强政治表述…………… (136)

第三编 本土意见领袖与维新舆论

第五章 清末政治维新与媒介对政治改良合法性建构…………… (156)

第一节 晚清幕府权力分化与媒介话语的选择…………… (157)

第二节 南北媒介网络与政治舆论导向…………… (165)

第六章 清末政治革新与意见领袖对维新舆论建构…………… (190)

第一节 早期维新派及洋务派对报纸舆论认知…………… (190)

第二节 政治改良与意见领袖对维新舆论建构…………… (198)

本卷结语…………… (223)

附录 第三章《香港船头货价纸》中相关“新闻”汇编(第197-239号)
…………… (227)

主要征引与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49)

第一编 清政府与舆论控制

第一章 晚清中央集权下媒介政治控制

中国封建专制的形成有个历史的过程，明清之际可谓登上中央集权的高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帝制，清代的中央集权表现在诸多方面，人与人等级依附关系是其集中体现。在社会信息资源的分配上，侧重谕旨上传下达的单向度传播，漠视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意见沟通的功能。清末中央集权对媒介的控制既要面对外报刊对华的舆论宣传，同时又要对解构政治意识形态为旨趣的民间舆论予以打击。总之，清王朝对官报的支持与对民营报刊管制并举。

第一节 上谕汇编及《行在钞报》 刊行与专制者话语表述

封建专制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家天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开头就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这是金字塔形的权力

分配,司马光认为这一政治运作模式易于家、国相安。帝王“家”天下的历史,如梁启超称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之谱系而已。专制之政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潜在的或显性的暴力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王朝由上向下发布命令,加强舆论一律,势成必然。这一政治思维持续二千余年。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入侵及西学东渐,晚清维新变法遂成时代主题。中央集权的统治策略亦调整,其与媒介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正如梁启超称:“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坠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① 政治改良离不开报刊舆论评判。

清封建专制主要就政治制度层面而言,政治结构及其出台政策显示意识形态的专制特征。清王朝颁行政策及其政治趋向的表述,主要通过媒介传播。媒介也对政治产生反作用,即有建构或解构作用。在西方报刊的冲击与影响下,近代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报刊。^② 其时清王朝而言,封建专制仍存在,上谕发挥着其上传下达的政治功能。这一功能在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的内忧外患社会氛围中尤显突出。1900年8月7日李鸿章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8月15晨慈禧与光绪仓皇逃离北京,是日北京沦陷。慈禧等经山西逃往西安。此期间清廷官员活动频繁。诸如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宫门钞”就有“宁夏副督统成鹤谢恩”、“福建按察使吴重熹请训”、“陕西布政使端方、陕西按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47页。

② 论及中国古代意义“报刊”,汪英宾称:“新闻报道作为政府的职能出现在商朝(公元前1783—公元前1135)和周朝(公元前1135—公元前247)。有关习惯风俗的新闻每年被来自王国不同地区的人收集,按季编成官报,并在封建领主中传播。书名《春秋》中‘春秋’本指春天和秋天,后‘春’、‘秋’指代一年四季。这显示书的记录囊括一年四季,《春秋》曾经孔子删改,内容包括鲁国前后242年的编年史,其中含孔圣人去世后的两年。《春秋》是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记述。”(Y. P. WANG: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ay, 1924. P11.) 在汪英宾看来,“正规新闻出版肇始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19年)。”(Y. P. WANG: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ay, 1924. P12.) 他称:“历史表明,汉朝有三种月刊,较有意思的是Yen Tan Bin或称Monthly Review。其时,Hsu Tsan和堂兄是文学家,他们常在Review上撰写文章,针砭时弊,评鹭学者和官员的人品。曹操是献宗皇帝的宰相。许劭(HSUT SAU)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月旦评》(The - Yeu Li或Monthly Dial)则属于另一种类型。《月旦评》(The - Yeu Li),刊登每月的重大政治事件。每逢初一上午,负责编辑Monthly Dial的官员将它呈献给大臣,大臣轮流向内阁宣读。《月榜》(The Yeu Pyan or Monthly Bulletin)是第三种形式,《月榜》(The Yeu Pyan)记录当月时政。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月榜》(Monthly Bulletin)在周朝的晚期已出现。”(Y. P. WANG: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ay, 1924. P12.) 其后中国历史经王朝更替,所谓新闻传播业基本上是官方上传下达的工具。